

延安精神中的自我革命基因与破解 “大党独有难题”的路径启示*

姚吉婷 化雪娜

(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要]延安精神中蕴含的自我革命基因深植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在延安时期的革命实践中得以集中迸发并形成初步的制度化雏形,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关键内源动力。进入新时代,面对长期执政条件下因规模超大、时间超长、使命艰巨而衍生的特殊风险与挑战,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历史自觉与战略主动,审时度势地作出“大党独有难题”的重大理论判断。破解这一关乎党的生死存亡与民族复兴的时代课题,亟需激活并创造性转化延安精神的自我革命基因。这要求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思想深处回答“为谁创造政绩、创什么样的政绩”,为自我革命确立价值坐标。现实路径在于:坚持思想建党与理论强党相统一,夯实自我革命的价值根基;践行人民至上与密切联系群众相统一,筑牢其力量源泉;发扬民主与严肃纪律相统一,强化其制度保障;弘扬艰苦奋斗与敢于斗争相统一,砥砺其精神意志,构建由价值、根基、制度、精神四维支撑的路径体系,在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建设规律认识的基础上,为党在新时代有效应对内部风险、成功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长期执政安全,提供兼具历史纵深与现实针对性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方案。

[关键词]延安精神 自我革命 正确政绩观 大党独有难题 路径启示

[中图分类号]D61; D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983X(2026)04-0016-1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作为一个拥有九千八百多万名党员、在十四亿多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坚强有力,是国家前途命运的核心所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对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党中央部署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

教育,要求“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为人民出政绩”^[1],其深意就在于着力防范和纠治因初心迷失、党性不纯而产生的种种问题,确保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符合新发展理念、造福人民的政绩观。这深刻指向了“大党独有难题”的核心关切:作为一个超大规模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在长期执政中有效克服精神懈怠、能

收稿日期:2025-12-13;修回日期:2026-03-20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中国共产党大党独有难题的形成原因及破解策略研究”(23DJC008);黑龙江省博士后资助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大党独有难题的破解策略研究”(LBH-Z24263)

作者简介:姚吉婷,法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化雪娜,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内生风险,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以自我革命完善自己,从而成功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鉴往以知来,循道以致远。解答这一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时代之问”,需从波澜壮阔的党史中汲取丰厚滋养与深刻启示。延安时期是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2]深入剖析延安精神的生成逻辑与核心要义,可以清晰地发现,其深层结构中蕴含着一种通过持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保持活力的强大自我革命基因。正是这种基因,驱动延安整风运动实现了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过大生产运动克服了极端物质困难,并通过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筑牢了政治根基。延安精神本质上回答了在艰难环境中如何建设坚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课题,其密钥正是彻底的自我革命。

延安精神中的自我革命基因,与新时代“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内在要求高度契合。基于此,立足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系统剖析延安精神中自我革命基因的理论渊源与历史呈现,阐明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进而,对标“大党独有难题”在新时代的具体表现与深层挑战,揭示弘扬自我革命精神的紧迫性;最后,探讨如何实现自我革命基因的时代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坚守政治方向强化思想引领、践行根本宗旨密切血肉联系、健全党内法规严明纪律规矩、砥砺奋斗精神勇于担当斗争等多维路径,系统阐述以永不停歇的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战略选择,从而为新征程上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坚实的历史依据与理论支撑。

一、延安精神中的自我革命基因剖析

延安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璀璨篇章,蕴含着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政治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3](P576)}深入剖析延安精神中生生不息的自我革命基因,正是为了探寻其穿越时空的价值内核,为新时代破解“大党独有难题”,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提供历史智慧与路径启示。

(一)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

自我革命绝非外在因素作用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段性任务或权宜之计,而是深植于其肌体血脉的本质属性与完成历史使命的内在要求。这一论断的理论根基,牢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无产阶级政党阶级基础、指导思想与历史使命的深刻阐释之上。

自我革命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鲜明的阶级性,由其阶级基础的历史地位所决定。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4](P410)}。相较于历史上其他曾扮演过革命角色的阶级,其革命性具有根本的差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精辟地指出,“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而“无产阶级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更进一步,“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4](P411)}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并非以一种私有制取代另一种私有制,而是要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并在这一进程中,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4](P421)}这“两个最彻底的决裂”表明,无产阶级的革

命不仅指向外在的旧世界,也必然指向内在于自身、由旧社会所沾染的一切落后观念与习气。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组织,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诞生之日起,其命运就与这个最具革命彻底性的阶级紧密相连,必须率先践行这种彻底的革命精神,否则便无法代表阶级的未来,无法领导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自我革命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其指导思想辩证本性的生动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强大武器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5](P94)}这种彻底的批判精神,自然地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主体自身。恩格斯曾深刻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4](P79)}这意味着,真正的革命政党从不讳疾忌医,而是将承认错误、分析错误、纠正错误视为前进的动力。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执政的实践中,高度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自我革命的重要武器,他强调:“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6](P117)}这种基于辩证法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扬弃,使得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避免陷入僵化与停滞,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实践勇气。

自我革命关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死存亡,是其践行根本宗旨、巩固执政基础的现实需要。马克思主义政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这一价值立场决定了,党必须时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旦脱离群众,就有丧失力量源泉和执政基础的危险。在局部执政的延安时

期,毛泽东同志就深刻思考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并找到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这第一个答案。然而,外部的监督最终需要通过内部的自觉行动才能发挥作用。如果党自身缺乏直面问题的勇气和刮骨疗毒的决心,外部监督就可能流于形式。因此,人民监督的效果最终要通过党的自我革命来转化和落实。自我革命要求党必须敢于刀刃向内,坚决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权力始终用于为人民谋幸福。这是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应对风险挑战、永葆生机活力的战略抉择。

(二)延安精神是自我革命精神在特定历史场域的集中迸发

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固有的自我革命基因,绝非停留于理论纲领的抽象原则,其生命力在于能够在具体而严峻的历史实践中被唤醒、被激发,以时代要求审视自身发展并转化为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强大力量。延安精神也并非抽象概念,而是通过延安时期的革命实践得以具象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斗争中所形成的革命精神形态;是党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进行自我革命、加强自身建设并最终走向胜利的伟大历史实践产物;是自我革命基因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一次空前深刻、系统而集中的历史性迸发。

延安精神实现了对主观世界特别是思想方法的彻底革命,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的自我革新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历史上,党内曾有过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时期,使中国革命付出沉重代价。抵达延安后,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问题,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与推动下,党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这场运动绝非一般的理论学习,而是一场直指灵魂深处的思想革命。其锋芒所向,是党内长期存在的、阻碍革命事业的主观主义思维模式,包括轻视实践的经验主义和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只

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7](P800)}通过这场运动,全党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标志着党在思想理论上摆脱了幼稚与依附,走向了独立与成熟,完成了对自身僵化思维模式最坚决的扬弃。

延安精神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创造性结合,实现了理论层面的自我突破与创新,彰显了党的理论自觉。延安时期,党在破除教条主义桎梏的同时,也以高度的理论自觉进行了新的理论构建。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时期撰写的《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立足中国实际,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科学回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和前途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简单重复,而是基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实践所实现的重大理论发展。比如,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同志对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的精准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革命策略的创造性丰富。这种在理论上的自我突破与创新,是党在思想层面进行自我革命的集中体现,标志着党从以往对既有理论的接受与执行,转向能够自主开展理论创造、指导革命实践的崭新阶段,从而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延安精神的核心特征,确立并升华了党的根本宗旨,这是对政党价值立场与权力来源的一次深刻伦理革命与政治革命。延安时期,党通过系统的理论阐述与鲜活的实践,将“为人民服务”提升到党的根本宗旨与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高度。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中明确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7](P1004)}这从根本上划清了中国共产党同一切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旧式政党的原则界限。这一宗旨的确立,标志着党在价值逻辑上实现了对旧政治的根本

变革:权力源于人民、必须用于人民,政党存在的意义不在于自身,而在于实现人民的解放与福祉。这内在要求党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坚决反对官僚主义、特权现象和任何脱离群众的倾向,从而为党进行持续不懈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根本的价值源泉与严格的衡量标尺。

延安精神所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在极端恶劣条件下锤炼党性、抵御腐蚀、永葆政治本色的作风革命与意志革命。面对日军残酷扫荡和国民党严密封锁带来的生存危机,党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这场运动不仅解决了经济困局,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锻造了党的作风。毛泽东同志后来总结道:“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7](P1016)}这种自力更生,是对“等、靠、要”依赖心理的革命;这种艰苦奋斗,是对贪图安逸、腐化堕落可能性的主动拒斥。延安时期建构起的党善于领导社会革命、敢于全面且深入地进行自我革命的革命形象^[8],使全党在劳动中与人民群众结合得更加紧密,在克服物质困难中锤炼了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形成了一种勤俭节约、廉洁奉献、昂扬向上的政治文化。这场作风上的自我革命,为党在日后执政环境中抵御“糖衣炮弹”攻击,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抗体和强大的免疫基因。

(三)自我革命基因在延安时期的制度化雏形

自我革命的生命力,在于能否从思想自觉转化为稳定的制度形态。延安时期的深远意义,正是在于党在开展思想整风与作风锤炼的同时,开启了将自我革命精神系统植入组织肌体的早期制度建构,标志着自我革命超越了特定情境下的政治运动或思想动员层次,开始寻求通过常态化的组织原则与工作机制来实现党的自我净化与完善。

这一时期,党对民主与集中辩证关系的把握达到新高度。通过整风学习等形式扩大党内民主,鼓励发表意见、批评工作,旨在通过民主

机制听取意见、纠正错误。同时,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央权威,实现了思想与政治路线的高度统一。边区政权实行的“三三制”,则是该原则在政权建设中的创造性运用,在确保党的领导前提下容纳多元力量,形成了具有包容与调节功能的政权形态。这种民主基础上的有效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广泛民主,为持续的自我更新提供了稳态结构。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制度化,确立了常态化的政治免疫与修复机制。延安整风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取代“残酷斗争”,将批评与自我批评定位为抵抗错误思想侵蚀的有效方法,并形成了一套规范性程序。其核心在于将批评定位为了解决思想分歧、增进团结、改进工作的工具。通过融入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它逐渐嵌入党的日常政治生活,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清洁”机制,使得发现问题、修正错误成为政治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为党依靠自身力量实现持续革新提供了稳定路径。

群众路线的系统化与工作方法制度化,构建了防止蜕变的核心纽带。群众路线在延安时期被明确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并发展为一套可操作的方法。“从群众中来”要求深入调研以克服主观主义;“到群众中去”强调政策需经群众实践检验,形成反馈循环。边区政府推行民主选举、欢迎党外批评等举措,是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构想付诸制度性探索,使人民监督能转化为推动政党自我检视的外部压力。这种制度化了的群众路线,成为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基础性安排。

系统化的学习教育与强化的纪律监督,提供了能力支撑与行为规范。面对“本领恐慌”,党在延安时期大规模兴办党校与各类干部学校,建立常态化的学习制度,旨在从思想源头提升党员素质。在纪律建设上,毛泽东同志重申并强化“四个服从”的纪律原则,明确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并通过严格执行

党纪、惩处腐败行为划定清晰红线。学习教育与纪律约束,一引一束,相辅相成,构成了对党员进行日常教育、管理与监督的早期制度形态,为确保党的队伍符合革命政党要求、使自我革命精神落实到基层提供了基础保障。

(四)自我革命基因的历史实践与时代传承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在民族危亡与自身弱小的双重困境下,实现生存下来、发展壮大、赢得未来。这一历史性难题的破解,无法依靠外部力量,只能通过一场以自我革命为核心驱动力的党的自身建设来完成。其建设实践深刻表明,延安精神的内核不仅是一套价值理念,更是一套通过主动、彻底的党的自身建设来破解时代核心难题的实践方法论,而自我革命则是驱动这套方法论的根本动力。

延安时期的建设始终以解决紧迫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为导向,自我革命则是破除建设障碍的开路先锋。延安时期的自身建设,每一步都贯穿着自我批判、自我扬弃、自我超越的革命性实践,其目标是破解党的生存与发展难题,其结果是锻造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9](P602)}。

自我革命基因在延安时期的制度化传承,旨在将破解难题的临时性建设转化为可持续的建设规律。无论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成熟定型、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党内政治生活常态,还是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系统化,都标志着党开始有意识地将自我革命的成功经验,沉淀为保障组织健康、防范政治风险、巩固建设成果的长效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角色从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革命党,转变为全面领导的长期执政党;党的中心任务由革命建国转变为现代化强国建设;历史使命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转变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与之相应,党的历史性难题,已从如何在危难中生存并夺取胜利,演进为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成功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尽管难题的具体内容已发生历史性转变,但其破解的根本方法论却一脉相承,即依然必须依靠慎终如始、持之以恒的党的自身建设,而其核心动力依然是彻底的自我革命。因此,面对新时代的“大党独有难题”,需要从延安精神中汲取的是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开启革命、以无私的勇气推进革命、以系统的思维巩固革命成果的政治智慧。

二、“大党独有难题”的具体表现与深层挑战

自我革命这一内生于党的基因,在全新的时代语境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与其执政地位和超大规模相伴而生的特殊挑战。这些挑战,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10](P52)}。唯有清晰辨识“难题”的特殊性与严峻性,方能更深刻地理解弘扬自我革命精神、激活延安精神当代价值的极端重要性与现实紧迫性,从而为探寻有效的破解路径奠定坚实的问题导向基础。

(一)“大党独有难题”的内涵与特殊性

“大党独有难题”的提出,基于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深刻洞察。这一论断不仅揭示了超大规模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治理的内在复杂性,更是在总结世界政党兴衰史,特别是苏联亡党亡国教训基础上形成的,标志着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理解其科学内涵与特殊本质,是破解难题的逻辑起点。

“大党独有难题”,是中国共产党这个超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为在复杂环境中完成其使命任务,提出的关系党和国家发展命运的重大理论命题^[11],其核心在于“大党”与“长期”双重特征叠加所衍生的特殊执政风险与治理挑战。这里的“大”,不仅指党员人数超过九千八百万、组织体系覆盖全中

国的“超大数量规模”,更指向领导十四亿多人口大国、肩负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目标的“超大规模”与“超大责任使命”。

“长期”,则特指作为在社会主义大国连续执政逾七十载的“长期执政党”所经历的“超长执政时间”。这种“大党”与“长期”的结合,使得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具有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政党的独特性和前所未有的严峻性。其内涵绝非一般意义上政党治理困难的放大,而是内生于规模效应、时间效应与使命效应相互交织、相互强化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之中。

在规模维度上,表现为统一意志与组织活力的矛盾。一个超大规模的政治组织,要实现思想、意志和行动的高度统一,是极其艰巨的系统工程。规模越大,内部思想观念的多样性、利益诉求的差异性、信息传递的衰减性、政策执行的偏差性便可能越显著。如何既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使全党如同“一块坚硬的钢铁”,又有效激发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首要挑战。这要求在严密的组织体系中,必须构建起既能确保高效贯彻,又能灵敏反馈、充满弹性的内部运行机制。

在时间维度上,表现为初心使命与历史惰性的博弈。长期执政既带来了丰富的经验与资源,也可能滋生历史惰性的潜在风险。随着时间推移,执政初期的“赶考”意识和创业激情,可能在和平环境与巨大成就面前,被精神懈怠的危险所侵蚀;在艰苦斗争中锤炼的党群关系,可能因权力长期浸润而面临脱离群众的危险。长期掌握政权,易使党内滋生固化的利益藩篱与因循守旧的思维定式。如何克服“承平日久、精神懈怠”的心态,防止权力异化与“既得利益”形成,持续激发全党“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坚定,是时间维度提出的永恒课题。

在使命维度上,表现为引领时代与风险叠加的巨大压力。党肩负着带领超大型文明古国实现现代化转型、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其复杂性与艰巨性世所罕见。这要求党不仅要应对

传统挑战,更需驾驭信息革命、意识形态斗争、大国战略博弈等“时代变量”;不仅要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还需统筹安全与发展,防范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使命的宏大性,要求党必须具备超强的战略定力、卓越的治理能力与高超的执政智慧。任何局部的失误都可能因“规模效应”被放大,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如何在高压执政环境下始终保持战略主动,是使命维度的核心挑战。

(二)“大党独有难题”的具体表现与历史镜鉴

“大党独有难题”的特殊性,在新时代已外化为一系列具体而严峻的风险挑战。这些挑战与延安时期面临的考验形式已大不相同,但在深层逻辑上存在历史回响。环境巨变使得革命战争年代被抑制的潜在风险,在长期执政与市场经济条件下被激活、放大,甚至以新样态呈现。将现实挑战置于延安精神这面历史透镜下审视,既能辨识问题的当代性,又能获得破解难题的深刻启示。

长期执政与数字时代叠加,共同催生精神懈怠危险。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今天,“承平日久、精神懈怠”的危险以新形式显现,其背后常伴随着偏离正确政绩观的驱动。部分党员为追求政绩而过度留痕、重复检查;因惧怕担责而回避深层矛盾,滋生“太平官”心态,缺乏持续奋斗的紧迫感。这些扭曲的政绩追求,侵蚀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加剧了组织内部的运行内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警示:“一切贪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骄傲自满、不愿继续开拓前进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12]这种精神懈怠与延安时期全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激情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新形势下保持思想定力的特殊重要性。

超大规模组织的治理问题在大数据时代呈现新的复杂性。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就尖锐批评过“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指出它“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13]当前,在运用算法等技术提升效率时,存在过度依赖数据、脱离实

际调研的风险。如何确保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原汁原味地落实到“最后一公里”,保持组织机体的高度灵敏与高效,是规模带来的直接治理考验。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多元化对党的纯洁性建设提出新要求。长期执掌全国政权,加之市场经济的逐利本性,极易侵蚀党内政治生活,权力寻租、利益输送风险剧增。从“为人民服务”滑向“为资本服务”或“为个人利益服务”,是脱离群众的深层表现。当前,腐败问题更加隐蔽化、复杂化,“圈子文化”与新型“围猎”交织,对党的纯洁性构成持续性、渗透性威胁。这要求必须将自我革命向纵深推进,坚决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

开放环境下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式更加隐蔽复杂。全球化、信息化时代,错误思潮的传播往往借助学术、文艺等隐蔽渠道,渗透力、迷惑性显著增强。部分党员干部可能出现理想信念动摇、价值标准模糊。当代青年党员思想活跃多元,如何在尊重个体差异、包容多样表达的基础上,筑牢全党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防止思想多元化演变为价值碎片化,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课题。这要求必须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提升对新型意识形态风险的识别和应对能力。

(三)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紧迫性与回归初心重要性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的自我革命是“第二个答案”,并强调“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3](P52)}这一论断精准地阐明,能否成功应对并化解内部风险、有效破解这一“独有难题”,是决定党能否在百年变局中屹立不倒、赢得未来的要害所在。

破解难题的紧迫性源于风险挑战的叠加效应与时代任务的艰巨性。当前,民族复兴进入关键时期,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长期存在且相互作用,若得不到解决,将产生连锁反应,形成系统性风

险。同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要求党必须具备超强的领导力、组织力和执行力。任务的艰巨性要求必须以“等不起”的紧迫感和“坐不住”的责任感,拿出治本之策。

破解难题的根本路径在于向内用力,激活自我革命这一“第二个答案”的实践伟力。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实践,党给出了自我革命这“第二个答案”^[14],它与“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相辅相成,但更具根本性。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人民的监督、时代的考验最终需要通过党自身的觉悟和行动来回应。当前面临的诸多内生性难题,其最终解决必须依靠党自身的力量,通过彻底的自我革命来实现。因此,将自我革命作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核心密钥,是由难题的内生性特质所决定的必然选择。

回归延安精神初心是激活自我革命内生动力的历史源泉与精神灯塔。延安时期,正是依靠强大的自我革命精神,党才得以在极端困境中实现凤凰涅槃。延安精神的时代价值就在于奠定人民拥护的底气、夯实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支撑,并激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新提供历史借鉴。^[15]今天,重温延安精神,就是要重新唤醒那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豪情,找回“只见公仆不见官”的为民本色,坚守“实事求是”的求真品格,发扬“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回归这份初心,能够为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强大的精神滋养和价值引领,确保自我革命保持不竭动力,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三、以自我革命基因破解“大党独有难题”

历史与实践充分证明,将坚持自我革命和解决党内问题相结合,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传统。^[16]对“大党独有难题”的剖析揭示了挑战的艰巨性,对延安精神中自我革命基因的挖掘则提供了破解难题的根本密码。

(一) 坚持思想建党与理论强党相统一,淬炼自我革命的锐利武器

延安整风运动的根本功绩,在于通过思想革命破除教条主义,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表明,自我革命首要的是“思想上的革命”。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及理想信念动摇的风险,必须将坚定理想信念、强化理论武装作为基础工程,坚持思想建党与理论强党紧密结合,不断淬炼党在思想上自我净化的锐利武器。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筑牢思想根基。新时代坚持思想建党,根本任务是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这一思想是引领民族复兴的强大武器。要坚持理论强党,推动理论学习往深里走、往实里走,教育引导全党深刻领会其立场观点方法。将强化正确政绩观教育作为理论武装和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唯有理论上彻底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从而从思想源头抵御错误思潮侵蚀,为推进自我革命奠定真理基础。

弘扬延安整风精神,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净化思想。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延安整风留下的有力武器。破解难题,必须让这个武器再度锋利,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17]要严格执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必须动真格,反对庸俗化倾向。党员干部要带头开展诚恳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之融入日常,成为锤炼党性、提高觉悟的“熔炉”,通过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防止小问题酿成大错。

坚守意识形态阵地,夯实政治定力。思想领域的斗争无声却激烈。弘扬自我革命基因,必须发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斗争精神,在意识形态领域敢于亮剑。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加强五史教育,坚决抵制一切削弱、歪曲党的领导的言行,使全党在复杂现象面前保持清醒,坚定“四个自信”,确保自我革命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二）坚持人民至上与密切联系群众相统一，夯实自我革命的牢固根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的核心，是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也是党进行一切自我革命的逻辑起点与最终归宿。破解难题，必须将坚持人民至上、践行群众路线贯穿自我革命全过程，使其成为检验革命彻底性的试金石和力量源泉。

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内化为自我革命的价值标尺与根本动力。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4](P413)}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首先要回答“为什么人”的问题。必须认识到，党进行自我净化、自我提高，根本目的是更好地践行初心使命，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任何背离这一宗旨的思想和行为，都应是自我革命锋芒所指。要将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密切党群联系、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核心行动；要把人民满意作为制定政策、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将纠治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作为重点任务。唯有如此，自我革命才能获得最深厚的道义支持和力量根基。

将密切联系群众升华为接受人民监督、汲取群众智慧的常态化机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是防止脱离实际的法宝。新时代，夯实自我革命根基，必须创新联系群众方式，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更为关键的是，要主动将自身置于人民监督之下。要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制度，保障人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善于从群众批评中发现自身不足。通过制度化渠道，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这一民主新路与党的自我革命紧密贯通，使外部压力有效转化为内部革新动力，形成内外协同的良性循环。

在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中，重塑血肉联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群关系的隔离墙。破解长期执政条件下脱离群众这一“最大危险”，必须以自我革命精神向其开刀。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权力观、政绩观，深刻认识权力来自人民。要大力弘扬调查研究之风，

真正沉到一线听民声、解民忧。要坚决整治文山会海、过度留痕等加重基层负担的问题，推动党员干部把精力用在抓落实、解难题、惠民生上。

（三）坚持发扬民主与严肃纪律相统一，健全自我革命的制度保障

延安时期对民主集中制的深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制度化，已展现出将自我革命精神转化为制度安排的初步自觉。新时代，必须将这一经验进行创造性发展，构建以民主激发活力、以纪律保障执行的制度体系，使自我革命成为稳定运行的内生机制。

完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制度，激发自我革命的制度效能。新时代健全自我革命制度保障，首要在于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原则。要进一步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使党员意见得以充分表达。在此基础上，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行动一致，使民主汇集的问题与智慧能有效转化为科学决策和统一行动，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确保自我革命的部署不折不扣地执行。

推动批评和自我批评常态化制度化，使之成为日常规范。要克服批评和自我批评庸俗化倾向，将其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要严格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高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质量，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带头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18](P15-16)}要建立经常性的党性分析等制度，使批评和自我批评融入日常。通过制度化约束，让“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实现“排毒杀菌、治病强身”的政治功能。

强化纪律建设的刚性约束，清除肌体病毒。必须把纪律建设摆在突出位置。重点抓好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各项纪律全面从严。要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对违反纪律的行为必须严肃查处，以严格执纪维护纪律权威。

纪律的刚性约束,如同为党的肌体设置免疫系统,是保障自我革命落到实处、防止问题反弹的坚固屏障。

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运行高效的权力监督机制。要整合党内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各种力量,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要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推进各项监督统筹衔接,增强监督合力。特别要加强对“关键少数”的监督。要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党员干部习惯在接受监督的环境中工作生活,从而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网络和纠偏机制。

(四) 坚持艰苦奋斗与敢于斗争相统一,砥砺自我革命的坚强意志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敢于斗争、善于胜利的意志,是党进行自我革命不可或缺的精神钙质。破解难题,必须重拾并升华延安时期的奋斗本色与斗争精神,将其有机统一于自我革命实践之中。

弘扬艰苦奋斗光荣传统,在拒腐防变中永葆政治本色,为自我革命提供纯净的精神底色。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传家宝,其核心在于奋斗不止。新时代,进行自我革命,必须坚决反对和抵制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记“成由勤俭败由奢”的历史教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甘于奉献的政治本色。要将艰苦奋斗精神融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严肃查处违规享受待遇、挥霍公款等行为,从生活作风、日常小节上严格约束,筑牢抵制腐败诱惑的思想堤坝,确保党的肌体不被安逸享乐所腐蚀,为进行更深层次、更触及利益的自我革命扫清思想障碍、提供纯净的精神内环境。

发扬敢于斗争的鲜明品格,在应对风险挑战中锤炼党性,为自我革命注入强大的实践动力。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不懈斗争史。党的自我革命本身,就是一场同自身存在问题的坚决

斗争。没有斗争精神,就不可能有彻底的自我革命。必须教育引导全党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在进行自我革命时,要敢于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敢于动真碰硬,不惧压力阻力;敢于刮骨疗毒,不怕触及深层利益。要在复杂严峻的反腐败斗争、意识形态斗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实践中,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考验中,不断磨砺党员干部的斗争意志和斗争艺术,使党的自我革命始终充满不妥协、不退缩的锐气和胆魄。

将奋斗精神与斗争品格融入新的伟大实践,在攻坚克难中检验和深化自我革命的成效。自我革命的效果,最终要体现在推动事业发展的实际成效上。新时代砥砺自我革命的坚强意志,必须同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要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革发展主战场、服务群众最前沿勇于挑重担、啃硬骨头,在应对重大挑战、解决重大矛盾中不断检视自身、提升能力。要在攻克艰难险阻的过程中检验党性、锤炼作风、发现短板,进而更有针对性地进行自我革命,实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辩证统一。如此,自我革命的意志才能在实践中越炼越强,其成果也才能在推动民族复兴伟业的征程中得到最生动、最坚实的印证。

四、结语

延安精神所承载的自我革命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锤炼出的鲜明品格和独特优势,它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在历史进程中保持先进性与纯洁性的根本性问题。历史与实践雄辩地证明,一个政党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更在于以同等决心改造自身主观世界的勇气。面对长期执政条件下的“大党独有难题”,从延安精神中汲取的智慧启示我们,破解难题的关键在于将彻底的自我革命内化为党的生存方式与发

展动力,其重要实践就是教育引导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价值源头校准发展方向、规范权力运行。这不仅是对历史经验的创造性转化,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时代发展。它深刻昭示,唯有永葆自我革命的清醒与坚定,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实干,做到“内无妄思”而“外无妄动”,中国共产党方能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必须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党的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成功跨越一切风险挑战,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延安精神的自我革命之光,穿越时空,将持续照亮这个百年大党走向更加光辉未来的前进道路。

参考文献:

- [1]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N]. 人民日报, 2026-02-24(1).
- [2]习近平. 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用 弘扬延安精神[J]. 求是, 2022(24): 4-7.
- [3]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6]列宁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7]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8]何虎生, 曹玮青.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塑造与形象建构[J]. 教学与研究, 2025(11): 26-37.
- [9]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10]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11]韩庆祥, 王若辰. 何解“大党独有难题”[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70(6): 1-11, 181.
- [12]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N]. 人民日报, 2016-10-22(1).
- [13]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14]习近平.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勇毅前行[J]. 求是, 2022(1): 4-15.
- [15]耿步健, 洪帆. 延安时期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及其时代价值[J]. 社会科学家, 2024(3): 160-166.
- [16]齐卫平. 勇于自我革命与解决大党独有难题: 深刻内涵与逻辑关联[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4(7): 51-62.
- [17]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为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N]. 解放军报, 2024-06-20(1).
- [18]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责任编辑 刘婉华】

The Self-Reform Gene in the Yan'an Spiri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Addressing the “Unique Challenges of a Large Party”

YAO Jiting & HUA Xuena

Abstract: The gene of self-reform embedded in the Yan'an spirit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a Marxist party. Entering the new er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with a high degree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strategic initiative, made the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judgment of the “special challenges that a large party faces.” Addressing this contemporary issue, which concerns the Party's very survival and the realization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urgently requires activating and creatively transforming the gene of self-reform inherent in the Yan'an spirit. This requires the whole Party to establish and practice a correct view of performance, answering in depth the questions of “for whom to create achievements and what kind of achievements to create,” so as to set the value coordinates for self-reform. The practical pathways are constructing a pathway system supported by four dimensions—value, foundation, institution, and spirit, this approach provides both a historically grounded and practically releva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plan for the Party to effectively address internal risks in the new era, successfully transcend the historical cycle, and ensure the security of its long-term governance.

Keywords: Yan'an spirit; self-reform;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governance performance; special challenges that a large party faces; implications